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地散发,居家办公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叫外卖”也已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随之增加的废弃塑料餐盒再次引发各界的关注——

塑料餐盒如何“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王嵩娟

多地疫情的散发让城市中的外卖小哥更加忙碌起来。他们穿梭于街道楼宇之间,为居家办公生活的人带来热乎的饭菜,但与此同时,社区垃圾箱中的塑料餐盒也与日俱增,为环境污染埋下了隐患。如何处理这些废旧餐盒?

废弃塑料餐盒应用广泛

“如何减少塑料餐盒的使用?塑料餐盒又如何回收?”作为一家平台企业,美团的外卖餐饮业务板块在整个业务领域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也正因为如此,要如何处理这些塑料餐盒也是美团绕不开的话题。在日前的《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理念与实践》报告发布会上,塑料餐盒再次被提及。

“目前塑料餐盒中超过90%为PP塑料材质,具有较高的回收及再生利用的价值。”美团“青山计划”项目总监田瑾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废弃塑料餐盒可以单独回收。”

事实上,早在2017年,美团就关注到关于塑料外卖包装的问题,并于当年8月启动了“青山计划”。“青山计划”围绕“更好生活、更美自然”的愿景,设立绿色包装、低碳生态、青山科技、青山公益四大板块,着眼于生活服务业绿色低碳发展,带动生态各方共建共享。”田瑾介绍说。

一方面,美团借力互联网产品能力,推进餐具“源头减量”,在外卖App上线“无需餐具选项”,并设置为下单必选项,通过公益能量激励等多种方式引导用户下单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现全国已有超1亿美团外卖用户选择无需餐具。

同时,美团与政府、社区、高校、NGO、餐饮商家及回收企业等主体合作,探索塑料餐盒分类回收模式。

回收后的餐盒还能做些什么?“废旧塑料可以通过回收、分拣、破碎、清洗、熔融造粒后形成再生塑料并投入新的生产环节,再生塑料产业的出现减轻了废旧塑料填埋、焚烧的处理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说,“塑料餐盒经回收、加工成型后,形成PP再生颗粒。其下游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是相对优质的再生料来源。”



疫情期间塑料餐盒用量明显增多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塑料餐盒回收加工成颗粒之后不存在同级使用的情况,有28%用于包装行业,22%用于建筑建材行业,汽车行业消费占比14%,农业行业占比13.5%,电子电器及家居行业占比分别为11%、9%。

餐盒回收率和垃圾分类制度息息相关

既然废弃餐盒是个“宝”,那么谁来收?又收得如何?

为更好地搭建塑料餐盒回收链条,推动回收及再生利用产业体系可持续地运营,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会同美团进行了调研并发布了《塑料餐盒回收再生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也首次为废弃餐盒摸清了“家底”。

报告显示,2020年餐盒使用量约107万吨,库存约13万吨,回收量约25万吨,全国平均回收率约为23.3%,略低于2020年26.7%的全国废塑料整体回收率。

“餐盒的回收涉及多个相关方和复杂的回收流程体系。居民、社区、环卫部门、垃圾中转站、环保企业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从餐盒丢弃、分类(厨余分离)、收集、运输和回收及再生利用构成了餐盒回收或处置的流程体系。”王永刚说。

据调研,目前塑料餐盒回收模式类型主要有市场驱动、自发分散;企

业主导、集中收运;政企合作、两网融合3种模式。

资料显示,美团首个城市级餐盒回收试点设在厦门,该项目覆盖厦门4个辖区、1000余社区及单位;2021年落地后已回收塑料餐盒量超千吨。

随后,2021年10月与爱分类爱回收合作落地上海杨浦区餐盒回收项目,在杨浦区内替换投放包含塑料餐盒回收品类的智能回收机,截至2021年底,日均餐盒回收量已达3吨/天。

不过,调研报告也显示,受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与执行、城市回收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消费者认知与参与度、餐盒消费的集中度、周边再生利用产业配套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废弃餐盒回收情况并不尽相同。

据介绍,报告通过实地考察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厦门6个城市区域内回收量的统计以及区域内的回收及再生利用产业数据对比,得出了城市区域回收率的估算值。

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回收率可高达60%以上,高于全国废塑料整体回收率。在经济发达、垃圾分类制度有效推行以及周边有配套的再生利用企业的地区,餐盒回收率较高。

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京津冀等,废弃餐盒属于易回收的品类,一次性塑料餐盒的回收活动较活跃;在经济

相对落后、周边没有配套再生利用企业的地区,餐盒的回收活动较少。

应收尽收才能实现高值化利用

这也意味着餐盒的回收利用并非某个行业的事,而需要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目前产业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大多数地方垃圾分类标准未将废塑料餐盒纳入低值可回收物的体系。大量餐盒被视作其它垃圾处理,制约了当地餐盒的回收,只能依靠当地自发且分散的个体商户进行回收;二是消费者对餐盒分类对餐盒可回收认知不足,餐盒分类的参与度不高,大多餐盒回收由第三方执行,总体分拣效率不高。”王永刚说。

王永刚尤其提到了缺乏全生命周期管理也影响了餐盒回收进程。

“餐盒‘标准化’程度低影响回收再生品质。在规格方面,我国的餐盒生产没有统一的标准,较大的设计差异造成打包空间占用大,从而导致清运效率低下。在材质方面,不同材质(颜色)的混合不利于再生料的高值化利用。其次主要城区内缺少必要的回收基础设施。塑料再生利用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王永刚表示。

事实上,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也建议在城市中要建设专门的塑料分拣中心实现废塑料“应收尽收”。

全国政协委员冯守华建议,地方政府应增加对分拣中心等回收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考虑为回收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免费的用地政策,以推动各地方分拣中心的建设。

“政府也要鼓励回收企业与环卫系统合作,充分利用既有的回收设施,针对既有城市建成区用地价格高昂的现状,制定灵活的合作方案,帮助回收企业降低前端收集的运营成本,既要实现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又要实现高值化利用。”冯守华说。

报告也建议,因地制宜完善垃圾分类制度,在适宜条件地区将塑料餐盒纳入可回收物目录;鼓励合并推广塑料餐盒标准化规范,推动塑料餐盒易回收易再生设计;降解塑料应用于塑料餐盒的替代方案需因地制宜、尝试限定在特定区域内集中管理;加强公众宣传教育工作,引导消费者参与餐盒回收活动。

76.8米!

“树王”为何长于藏东南?

西藏墨脱县格林村的原始森林里,一棵高76.8米的不丹松这几天闯入人们的视野。“树王”的荣誉接踵而至——它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大陆已知最高的树。这一树高数据刷新了此前位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高黎贡山的72米秃杉的最高纪录。

2013年,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负责人李成来到墨脱县参加野生动物考察工作,当他第一次看到这棵树时就拍下了大树的照片,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推动着大树的准确测量工作。

藏东南地区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还拥有世界上最独特的生态系统。在罕有人至的原始森林内,西藏柏木、云杉、冷杉等树木遮天蔽日,爬树龙等攀援植物沿着树木直上几十米,苔藓铺满林间,各种珍稀的兰花、石斛附着在树上自由生长,林中弥漫着树脂和野花的芬芳。

大自然为何将世界上这片美丽的森林留给了中国?

李成认为:一方面,是温暖的印度洋所带来的优越水热条件和特殊地形为原始森林的发育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一地区还因高山与河流所造成的交通不便而人迹罕至,这也间接使森林生态系统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不过,树的高与大实际上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李成解释说,“大的树不一定高,高的树也不一定大。其实,世界各地都能找到胸径超过3米的超级大树,但是能找到高度超过80米大树的地方却不多。”

作为最早发现它的人,李成其实前后做过几次测量。

“最早的一次是用老式激光测量仪,当时测量的结果是79米左右,但受限于气候和各方面条件,测量的结果不是很准确。”

第二次,李成和同事一起使用无人机,从树的底部起飞,以无人机所飞的高度为参考测量的标准,当时所得的结果是81米左右。

然而科学的测量不能是一个概念,它需要反复地确认和精密地校正。今年4月,受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委托,北京大学吕植和郭庆华课题组与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及北京数字绿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成了联合调查队,对墨脱境内的不丹松进行调查。

联合调查队采用无人机激光雷达系统进行大范围测绘,发现了11棵潜在高于70米的巨树。随后调查团队携带背包激光雷达进入森林腹地,对11棵巨树进行精细测绘。

调查中,研究团队在背崩乡格林村共发现8棵高度在70米以上的巨树,高度从70.2米到76.8米,是目前

中国大陆经过精准测量发现的巨树分布最多的区域。

除了获取最高树的精细三维点云数据,测量团队还采用无人机获取照片拼接成巨树等身照。除此之外,还采用无人机悬吊测绳以及卷尺测量等方法,进行了高度和胸径验证,记录了详细的数据。测量结果出来后,李成除了激动更多的是充满希望。

“此前我们一般说最高的树大部分是秃杉或者望天树,这次的发现有可能丰富这一认知。”更让李成充满期待的是,在墨脱和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区域范围,还有可能存在更高的树。“因为格林村曾发生过中国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因地震而断裂的树,包括这棵最高树也是断裂过的。”

如今,格林村作为巨树分布最多的区域,这一发现无疑充分体现和证明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这一区域具有建设国际知名国家公园的潜力。”李成认为。

在研究团队的建议下,最高树被取名为“辛达布”,本地门巴族语意为“神树”。未来,对“辛达布”的探索不止于身高,研究团队还会对其树龄、种群特征、形成原理、分布特征、群落生物学乃至森林碳汇做更多深入的研究。

在“辛达布”的身上,人们发现了节茎石仙桃、耳唇兰、眼斑贝母兰、匍茎卷瓣兰、墨脱越橘、小尖叶越橘、中型树萝下等多种附生保护植物与墨脱特有植物,这进一步证实了“辛达布”所在的墨脱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具有极高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取名也寓意原始森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肖琪)



果树换杨树 环保又致富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政协助力生态环境治理

“杨絮污染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种果树好啊,环保又致富。”4月2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淮北村党组织书记王建全拿着与乐享果园田园综合体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既高兴又感慨。

3月初,淮阴区政协委员朱嘉语一行到联系的淮北村走访,许多村民反映杨絮安全隐患问题,却没有提出好的解决办法。不久一场协商议事活动在淮北村议事室火热开展,村党组织负责人、挂钩的政协委员、林业部门专家、村干部、村民代表等齐聚一堂,面对面协商。

“每年杨絮一飘,我鼻炎就发作,太烦人了。”

“就是,就是。因为皮肤过敏,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敢出门。”

“不光影响人,落到田里还会影响小麦正常扬花,导致减产。”

“去年就因为杨絮引发的火灾,把我三轮车都烧坏了。”

“杨树生长快,几年就能卖钱了。”

“我看老刘庄村种碧根果就不错。”

……协商现场,村民们畅所欲言。根据前期调研情况,朱嘉语委员提出,“换成果树不但能彻底解决杨絮污染问题,还能给村民带来更多收益。”

“种植杨树弊大于利,应该更换成果树。”“种果树要选择好品种,不仅要好吃,还要有观赏性。”卜春雷和几位村民表示赞同,同时也提出自

己担忧,家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销售问题怎么解决。

“可以与专业的农业公司开展合作。”陈建春委员提议,从“一家一户”到“抱团发展”,并推荐了乐享果园田园综合体的相关信息。

会后,村里很快与乐享果园田园综合体取得联系,洽谈合作。由于项目用地涉及的农户较多,一时难以统一意见。负责该村协商议事工作的漆海飞介绍,“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围绕果树品种、水果销售等,几位委员又协助我们召开了3次协商会。”最终大家形成共识,由村委会提供空间土地资源,乐享果园田园综合体提供3万棵车厘子、西梅,淮安餐饮食材供应协会负责销售。

“分歧再大,争论再激烈,让大家自己商量,不同的意见逐渐就统一了。”王建全说,大家的事只有大家商量才能办得好。

今年,淮阴区政协还将围绕淮沔河生态廊道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农村垃圾处置等议题,通过专题调研、提案、社情民意等方式建言献策,助力生态环境治理。这也是淮阴区“政协委员在行动”系列活动的一个缩影,该区政协将3-5名委员组成1个履职小组,对口联系2-6个村(社区),让委员与群众零距离沟通,聆听基层声音,感知基层需求。借助政协委员的力量,群众许多“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有效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将民生实事落实到“最后一米”。

(马金宝 江迪)

社情民意

sheqingminyi

农村蚯蚓“灰色产业”该管管了

龚笑平

当您看到成千上万条蚯蚓尸横街头,被暴晒于阳光之下时,您会做什么感想?这是笔者在鄂西北某市农村采访时发现的一幕。深入下去,或许您还会发现有人正拿着工具在田埂上、在堤坝上电捕这一条条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蚯蚓。

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被人从土地上请了出来,广泛用作药物、食品和饲料,被赋予了更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其对土地、对生态环境的真正作用和长期影响却再也得不到保证。

据了解,近几年,这种以大量捕猎、收购、加工、售卖蚯蚓为回报的产业正在南方一些农村兴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仅笔者走访的城市,两年来从无到有,已发展出蚯蚓收购加工点6家。每家旺季每日可收购活蚯蚓1000斤左右。发展势头可谓强劲,环境影响日益增大。

造成这一产业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原因,笔者认为有:

一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些企业认准蚯蚓价值,把蚯蚓作为生产原材料,大量购进价格较低的蚯蚓,降低生产成本;而少数农村个体经营者认为有利可图(活蚯蚓收购每斤5元左右,加工晾干后每斤100元左右),因此建立网点,大肆收购,并加工成半成品后卖给企业;少数地龙仪(电击蚯蚓的设备,每台1000元以上)生产厂商打着帮农民致富的旗



号,线上线下大肆售卖设备获利;不少农民看到“致富”门路,购买地龙仪,电捕活蚯蚓(旺季日可捕40斤左右),卖给收购加工网点得到收益。

二是环保意识薄弱。少数农村群众认为蚯蚓遍地都是,捕杀一些,对环境影响不大。同时对电击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收购网点自认为只是把蚯蚓当成中药材或原材料收购,似乎与环保问题无关;而相关企业只管从收购点购买原材料,看似与捕杀蚯蚓无关,实则“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三是生态发展理念不牢固。有些地方的同志认为,发展产业不容易,农民致富不容易,生态不生态,只要能发展、有产业就行,明里暗里对这一产业不管不问,任其发展。

四是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蚯蚓既没列为保护物种,也未在相关法律法规专门提及。出现问题也不该如何处置。一些部门接到反映后,多以找不到法律依据为由,草草处理了事。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建议:一是所涉部门及地方先行拿出措施,出台整改措施,收缴地龙仪,叫停



生产厂商,整治收购加工点,对所涉企业做出限制性规定等进行规范。

二是有关方面把电捕和大量收购加工蚯蚓列为环保督察事项,加大整治力度,确保整治实效。

三是立法机关和有关方面开展立法调研,制定完善遏制这一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四是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结合农村实际,广泛开展环保政策和环保知识宣传,增强群众环保意识。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